

# 在浪漫与反浪漫中建构完美的世界<sup>①</sup>

——考琳·麦卡洛小说的生态审美

徐梅<sup>1,2</sup>, 刘久明<sup>1</sup>

(1. 华中科技大学 中文系, 湖北 武汉 430074; 2.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督导中心, 北京 101400)

**摘要:**浪漫主义自然观和工具主义自然观的冲撞在澳大利亚作家考琳·麦卡洛的作品中表现为浪漫/反浪漫的纠葛,拥有浪漫情怀而又饱经各种创伤的考琳·麦卡洛在对自然主题进行表达时,表现得浪漫而又反浪漫,她在对自然进行浪漫主义想象的同时,又对浪漫主义自然观进行了反拨。在反浪漫的基础上,她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阶级、种族、身份追寻等问题进行生态学意义上的审视和思索,建构了一个完美的世界。

**关键词:**考琳·麦卡洛;浪漫;反浪漫;自然观;生态审美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3-0039-06

对完美人性、英雄道义、澳大利亚独特自然风情的浪漫化书写是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考琳·麦卡洛的作品大获成功的重要因素,她的作品所具有的独特的浪漫主义情愫也提升了澳大利亚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评论者因为她对澳大利亚独特自然风情的浪漫化描摹、对朴实人性的诗意想象、对自我的勇敢追寻、对禁爱的大胆书写、对人类本真状态的勾勒等,将她归入浪漫主义作家之列。但是,也有研究者以她作品中的现实主义题材、反浪漫主义叙述方式为依据,否定她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因素,进而将她归入现实主义作家之列。Mary Jean DeMarr总结了学界在此问题上的对立:一方面,“浪漫经常被视为考琳·麦卡洛作品的基本风格”<sup>①</sup>;另一方面,“罗马系列小说”等被认为并不具备浪漫主义特征<sup>②</sup>。考琳·麦卡洛本人对于评论界的争执不置可否,她既为自己被归入浪漫主义之列而感到惊诧,“羡慕和尊重我

作为神经科学家工作的人突然说我是女性浪漫作家”<sup>③</sup>;同时又承认自己的某些作品的确具备浪漫主义特征,如《苦乐参半的人生》《荆棘鸟》。<sup>④</sup>

通过文本细读不难发现,考琳·麦卡洛一直在浪漫与反浪漫之间徘徊,浪漫主义与反浪漫主义在她的笔下既有对立,也有统一,而最终走向理性主义。尤其在对自然主题进行表达时,她的浪漫/反浪漫叙事特征更为突出。作为一名拥有浪漫情怀的作家,考琳·麦卡洛对自然的美、自然的魅力进行了诗意书写;但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她又无法忽略自然的狂暴,无法忽视生态危机,无法忽视传统的匍匐在自然脚下的农牧生活的局限性。

本文以考琳·麦卡洛对自然进行的浪漫/反浪漫的双重书写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其在作品中呈现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人文主义理想及生态

① 收稿日期:2018-10-17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基金文科重大交叉项目(2017WKZDC016)

作者简介:徐梅(1978—),女,河南永城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欧美文学研究。

① Mary Jean DeMarr. Colleen McCullough: A Critical Companion.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6, P. 22.

② Mary Jean DeMarr. Colleen McCullough: A Critical Companion.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6, P. 25.

③ Colleen McCullough: A sweet turn on romance. October 20, 2013. <http://www.smh.com.au/entertainment/colleen-mccullough-a-sweet-turn-on-romance-20131015-2vjz8.html>, 2013-10-20.

④ Linda Morris. A return to the thorny question of romance for Colleen McCullough. September 25, 2013. <http://www.smh.com.au/entertainment/books/a-return-to-the-thorny-question-of-romance-for-colleen-mccullough-20130925-2udtb.html>, 2013-09-25.

主义自然观。在考琳·麦卡洛的笔下,自然是双面的,有时残酷无情,肆意掠取人类的生命,威慑人类的精神世界,控制着人类;有时又是人类向往的乐土、给予人类启迪的精神导师,是人类放松自我、寻觅到真我的诗意王国。与传统浪漫主义者相比,考琳·麦卡洛打破了传统浪漫主义对自然进行至上讴歌的传统,她没有一味地描摹自然的美好,而是从客观、现实的角度,对自然的破坏性、久居在澳大利亚内陆的游牧民的劣根性进行描写,呈现出自然的暴虐和局限性的一面。她并没有像传统的浪漫主义者一样,倡导回归自然、隐匿于山水之间,而是从反浪漫的角度,遵从现代世界的发展规律,展示了丛林精神、土地情结的局限性,让“德罗海达时代”走向终结,让生于英国本土或澳大利亚黑土平原上的子代们逐渐摆脱父辈们因自然和土地而萌生的局限性,通过知识的力量,走向现代文明,通过阶级融合、民族大同等途径建构了一个充满生态文明的完美世界。

### 一 浪漫情怀的张扬:自然的温情

推崇自然、张扬个性向来被视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双翼<sup>①</sup>。自卢梭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sup>②</sup>“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sup>③</sup>等观点之后,浪漫主义文学便将其奉为圭臬。澳大利亚当代文学中的部分作品因为对充满澳大利亚独特风情的自然景观的描绘而备受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Gwen Morris、Mary Jean DeMarr等研究者从故事发生的背景<sup>④</sup>、反城市书写<sup>⑤</sup>等不同的角度对考琳·麦卡洛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元素进行过阐释。

在麦卡洛的作品中,自然不仅是人类栖居的理想国度,还是启迪人类更加坚韧的精神导师,是帮助人类寻觅到真我的神奇力量。在对自然主题进行表达时,考琳·麦卡洛的浪漫情怀首先体现

在对人类栖居环境的诗意描摹上。在她的作品中,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游牧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在以澳大利亚内陆德罗海达为主要背景的长篇小说《荆棘鸟》中,对于初到者——克利阿里一家而言,与在新西兰的困顿生活相比,德罗海达所代表的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游牧生活是闲适、自由、舒展天性而又充满温情的诗。刚到德罗海达时,他们看到的是令他们震惊的“有着完美的家庭格调,有着优雅的乔治王朝的门面和正在发芽的紫藤葡萄、千万株玫瑰”<sup>⑥</sup>的宅基和成群的牛羊,种类繁多的鸟类和奇特的自然景观。此外,他们还深切感受到了这片黑土平原上人性的善良和温暖。因此,尽管克利阿里一家像荒原上的其他人一样无法领悟荒原的神秘,但是他们却由衷地喜欢上了这片巨大、不可捉摸的荒原。这里的一切都令克利阿里家的男孩们着迷,在这里有着真正的“天人合一”,“帕迪和男孩们很喜爱这个地方……好像他们也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sup>⑦</sup>。考琳·麦卡洛在《荆棘鸟》中对人类栖居环境的诗意想象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打破了西方文化将自然与人进行二元对立式分割的传统,将自然视为人类生活的乐土。考琳·麦卡洛对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诗意游牧生活图景的憧憬与她本人对中国文化的青睐不无关系,她在《荆棘鸟》《恺撒大传·十月马》《呼唤》《摩根的旅程》等多部作品中均设置了遥远、神秘的中国意象。

在考琳·麦卡洛的笔下,自然不仅是人类的诗意栖居之所,同时还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荆棘鸟》中,神秘的荒原拥有令人惊奇的强大生命力,在经历一场罕见的干风暴造成的大火扫荡之后,“土地复原的速度快得让人惊奇;不到一星期,小青草的嫩芽就从粘粘的泥淖中探出头来了;不到两个月,烤焦的树木就长出了新叶”<sup>⑧</sup>。原始荒原的强大生命力给予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①刘超:《文学本质论争与人文学科逻辑》,《中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②(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页。

③(法)卢梭:《爱弥儿(上卷)》,李平沅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页。

④Gwen Morris. "An Australian Ingredient in American Soap: The Thorn Birds by Colleen McCullough",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1991 (24): 59-69.

⑤Mary Jean DeMarr. *Colleen McCullough: A Critical Companion*.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6, pp. 247-248.

⑥(澳大利亚)考琳·麦卡洛:《荆棘鸟》,晓明、陈明锦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

⑦(澳大利亚)考琳·麦卡洛:《荆棘鸟》,晓明、陈明锦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

⑧(澳大利亚)考琳·麦卡洛:《荆棘鸟》,晓明、陈明锦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页。

们无限的激励和热情,促使生活在荒原上的人们如这片广袤的荒原一样坚韧、热情,“如果说人们是坚韧和振作的,那是因为土地没有给他们颓丧的时间;那些软弱的,没有热情和缺乏耐心的人不会在大西北久住”<sup>①</sup>。因此,这片充满魔力的土地使生活在此地的人们滋生了浓重的土地情结,唯有在这片黑土平原上,他们才能寻觅到真正的自我。《荆棘鸟》中信奉天主教的新兴家族们,在澳大利亚这片新开垦的土地上找到了不受家族、阶级、历史笼罩的自我:“……他们是他们所能看到的一切的主人……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这地方了……大西北就是他们的家乡。”

“考琳·麦卡洛小说中的生命个体曾经因为外在社会因素的羁绊、自我意识的缺失、自身劣根性的存在等,一度处于卢梭、海德格尔和萨特所言的‘非本真’状态,深受创伤,但是,经受苦难的他们在自然的启迪下、在知识的感召下,不仅依靠顽强的生命意志和执着的荆棘鸟精神挣脱了苦难,而且,实现了对‘本真性’的回归。”<sup>②</sup>在考琳·麦卡洛描绘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浪漫画卷中,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获得了生命的启迪,卸下了文明的外壳,回归到了真我状态。考琳·麦卡洛在《恺撒大传·十月马》《呼唤》《遍地凶案》等作品中均强调了人在大自然中获得的舒适和自我。《遍地凶案》中的卡尔米内探长只有在每次开车驶向蔚蓝色的大海时,才能摆脱纷乱案情、复杂人际关系的烦扰,才能感受到发自内心的轻松和自由。《呼唤》中静幽的深潭更是成了精神和肉体遭受双重压抑的伊丽莎白的精神王国,这里不仅可以让她忘却无爱婚姻的痛楚,而且可以让她亲近自己的灵魂,正如她感叹的:“深潭让我保持了健全的心智。”<sup>③</sup>《摩根的旅程》中的理查德·摩根不仅在大自然中发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世外桃源、铸就了爱巢,而且,还发现了一个与英国时期截然不同的自我;作品中的多万纳也对澳大利亚这片弥漫着异域风情的土地充满了留恋:“……他喜欢这种微不足道的感觉,他因此而得到一种

慰藉……”<sup>④</sup>

## 二 反浪漫情怀的呈现:自然的暴虐

与传统浪漫主义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考琳·麦卡洛没有一味地赞颂自然,也没有倡导远离现代文明、回归自然。作为一名饱经家庭、民族、文化等多重创伤的现实主义作家,考琳·麦卡洛无法忽视现代科技对自然的破坏,无法忽略传统游牧生活的局限性。因此,她在对自然的诗意和温情进行浪漫式呈现的同时,并没有沉溺于自然,而是展现了自然暴虐的另一面和生态失衡的严重后果,并在此基础上探寻通过知识、科技、新文化融合等渠道重建生态和谐完美世界的方法。在她的笔下,自然不是一味的温情脉脉,不是一味的春暖花开,自然也有狰狞可怖的一面:莫名的大火、常年的干旱、无处不在的灰尘、攫取人类灵魂的雷电、肆虐的洪水等自然灾害时刻威慑着人类及其他万物的生命;拥有强大生命力、沉默无声的土地在以她的宽厚接纳着纷至沓来的自由移民、放逐移民及被驱赶至此的土著居民的同时,也承载着现代科技发展所造成的生态失衡的严重后果。

考琳·麦卡洛对自然的反浪漫书写首先体现在她对自然双面性的呈现上。《荆棘鸟》的故事背景是澳大利亚美丽、生机勃勃与荒凉并存的德罗海达,这片土地“饱受着轮番而至的旱涝侵躏,索取时,残酷无情;花开时,绚丽烂漫;造化慷慨的年节,又不失丰饶。天底下再没有哪一个地方如此怪诞离奇”<sup>⑤</sup>。小说中的“火”这一自然意象也具有双面性,“火本身有一种超乎世间万物之美的壮观,因为它是一种来自天上的东西,一种无情地来自遥远的日光的東西,一种来自上帝和魔鬼的东西”<sup>⑥</sup>。在《摩根的旅程》中,在初到此地的“流放犯”的眼里,原始、蛮荒状态的澳大利亚是贫瘠、死亡的代名词;另一方面,这里原生态的自然气息也是令他们的心灵得到慰藉的天堂。这里

①(澳大利亚)考琳·麦卡洛:《荆棘鸟》,晓明、陈明锦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页。

②徐梅,刘久明:《后殖民时代的性爱书写:人性禁锢与真我回归——以考琳·麦卡洛作品为例》,《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③(澳大利亚)考琳·麦卡洛:《呼唤》,李尧译,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④(澳大利亚)考琳·麦卡洛:《摩根的旅程》,李尧、李轶群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页。

⑤(澳大利亚)考琳·麦卡洛:《荆棘鸟》,晓明、陈明锦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⑥(澳大利亚)考琳·麦卡洛:《荆棘鸟》,曾胡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页。

旖旎的自然风情令他们陶醉,这片黑土地给予他们丰厚的回报,他们在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劳作过程中,不仅重建了家园,而且还寻回了在英国传统文化束缚下久违的自我。

在对自然进行的反浪漫书写中,考琳·麦卡洛还剖析了自然的局限性。在《荆棘鸟》中,与充满诗意的德罗海达游牧生活相伴的是暴虐的干旱、无情的大火和莫名的洪灾,它们在吞噬着人类的生命、威慑着人类的精神世界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匍匐在其脚下、墨守陈规、卑微而又充满奴性的子民。由于对自然和土地的过分依恋,克利阿里家的男孩们呈现出了集体性的腼腆、自闭、拒绝婚恋等特征,他们“迷恋于自然和土地,他们同样不渴望女人、舒适和生活乐趣”<sup>①</sup>。而这一切皆因为“他们太腼腆了,这是大地的性格,因为大地不要感情的表达或社交的风度”<sup>②</sup>。因此,久居于此的克利阿里家的男人们无法适应外界的生活,在时尚的罗马街头,他们的羊皮袄和大地一般拘谨的举止使他们成了一群远离现代文明的异类。除了自然和土地赋予他们的局限性,久居于此的人们还有着挥之不去的固执和奴性,“布里斯班的因尼格·琼斯的男人,在长期天气预报方面有不凡的才能,他运用的是太阳黑子活动的新方法,可是,一到黑土平原,就没有人相信他的话了,黑土平原的人们是死抱着他们那种深入骨髓的陈腐观念不放”<sup>③</sup>。

虽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德罗海达时光是美好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德罗海达人对土地的固守、对伙伴情谊的痴迷、对丛林精神的沉溺等传统陋习统统遭遇阻隔,克利阿里家男性子代们的不孕不育预示着德罗海达时代的终结。克利阿里家唯一的后代——朱丝婷远离德罗海达奔赴欧洲追寻自我则预示着德罗海达必须像拆掉“十七道门”那样:敞开胸怀,面向世界。也唯有如此,德罗海达才能成为真正的适宜于人们寻求自我的诗

意空间。

### 三 生态美的呈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约翰逊·贝特指出,“栖居”意味着一种归属感,一种人从属于大地、被大自然所接纳、与大自然共存的感觉……这种归属感的产生有两个前提:一是“诗意地”生存,生存在审美愉悦当中,生存在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当中;另一个前提就是要非常值得地生存,而要做到“非常值得”地生存,就必须尊重大地,对所栖居的大地负责任。<sup>④</sup>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曾经强调:“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sup>⑤</sup>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曾指出:人类要诗意地栖居,就必须“保护大地”,因为“人不是自然的主人,人只是自然的看护者”<sup>⑥</sup>。对自然的两面性有着清醒认知的考琳·麦卡洛也清晰地指出了人类运用现代科技对自然施暴的严重后果和人与自然博弈的结果及人与自然之间、现代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应有关系,即和谐相处。

在她的作品中,现代文明是导致人类灾难的罪魁祸首,人类不得不忍受生态遭受破坏引发的恶果。《荆棘鸟》中的昆士兰由于制糖业的发展而终年被糖臭包围;德罗海达由于人类对生物链的肆意破坏而深受兔子泛滥的困扰;《呼唤》中的格拉斯哥城由于毫无章法的淘金狂潮而成了“一座让人心悸的城市”<sup>⑦</sup>。在《荆棘鸟》中,考琳·麦卡洛通过拉尔夫的眼睛对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博弈结果进行了审视:“这片土地如此美丽,如此单纯,对擅自控制它的人们的命运是如此的冷漠。他们也许能攫取它,但是在漫漫的岁月中却是它控制了他们。除非他们能够呼风唤雨,否则,总是这片大地统治他们。”<sup>⑧</sup>在《恺撒大传·十月马》中,她强调“……如果人类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

①(澳大利亚)考琳·麦卡洛:《荆棘鸟》,曾胡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06—207页。

②(澳大利亚)考琳·麦卡洛:《荆棘鸟》,曾胡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页。

③(澳大利亚)考琳·麦卡洛:《荆棘鸟》,曾胡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

④王诺:《欧美生态批评》,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92—9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⑥王诺:《欧美生态批评》,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⑦(澳大利亚)考琳·麦卡洛:《呼唤》,李尧译,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⑧(澳大利亚)考琳·麦卡洛:《荆棘鸟》,曾胡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要学会与别的动物和谐共处,更要敬畏自然”<sup>①</sup>。

人与自然怎样才能和谐相处?在《呼唤》《恺撒大传·十月马》《摩根的旅程》《班纳特小姐的自立》等作品中,考琳·麦卡洛通过“书”“藏书室”“图书馆”所象征的知识的力量及文化融合、民族大同等途径,建构了一个生态、文化和谐完美世界。

考琳·麦卡洛在第一部家世小说《荆棘鸟》中终结了匍匐在自然威力之下的德罗海达时代,即关于澳大利亚未来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在第二部家世小说《呼唤》中,她通过亚历山大——遭受英格兰遗弃的移民之手、通过知识的力量建构了一座颠覆传统的新型城市——金罗斯。从信仰层面上来讲,亚历山大摒弃了以往压制、丑化、折磨自己的长老教会;在人类文明传承问题上,他强调图书馆、学校等知识传播机构在金罗斯城中的重要性;在民族、种族融合问题上,他鼓励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孩子都接受教育<sup>②</sup>,反对澳大利亚当局对黄色人种的压制政策;在城市建构方面,他充分考虑生态因素,采用先进的排水设施,防止污染;在精神空间的塑造上,他严禁卖淫行业进入金罗斯城。可以说,考琳·麦卡洛通过对自然进行的浪漫/反浪漫书写,通过对金罗斯城的建构,勾勒了一个阶级融合、民族大同、精神信仰健康、充分考虑人性和自我发展空间、尊重自然、富有生态气息的完美世界。

与同时期的澳大利亚作家相比,考琳·麦卡洛对自然的书写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和一定的前瞻性。澳大利亚目前“最多产、最负盛名”的作家——蒂姆·温顿也强调“我们要充分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赖性”,她还坦言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以很直接的方式完全沉浸在自然和自然力对他们生活的冲击之中”<sup>③</sup>。澳大利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在《战车上的乘客》中对澳大利亚传统文化中颂扬丛林精神、讴歌兄弟情义的陋习进行了犀利的指责与批判,但同时,他也认为作为拯救人类苦难的途径之一,自然在拯救人类灵魂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在对待自然的态度的上,考琳·麦卡洛与蒂姆·温顿、帕特里克·怀特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都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以及自然对于人类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是,考琳·麦卡洛更进一步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思考了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问题,并提出了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建构生态和谐完美世界的方式、方法。囿于时代及个人阅历等方面的影响,考琳·麦卡洛对自然进行的浪漫/反浪漫书写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她对澳大利亚内陆游牧生活的诗意书写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特征,她的诗意想象和浪漫化倾向将澳大利亚内陆环境的恶劣、土地的贫瘠浪漫化了,并在有意无意中回避了被外来殖民者驱逐至此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悲惨生活际遇。来自移民家庭并有着长期国外流散经历的考琳·麦卡洛无缘对澳大利亚内陆的土著民群体进行深入的体察。作为一名移民的后代,她游离于当地土著居民悲惨的劳作生活之外,只能从一位旁观者、一位诗人的角度对澳大利亚内陆的自然景观进行了浪漫化的想象和描摹。

考琳·麦卡洛之所以对自然进行浪漫/反浪漫书写,对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进行理性思索和生态学意义上的建构,最主要的原因不得不归结于她特殊的人生观、价值观及她所处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考琳·麦卡洛幼年时期曾随母亲寄居在澳大利亚内陆的剪羊毛工作站,澳大利亚内陆奇幻的自然景观镌刻在她的脑海中,并一直影响着她对自然的浪漫化书写,但家庭、民族、文化等多重创伤让她无法在浪漫主义想象空间里长久地徜徉。迫于生计,她曾弃文从医;为避免成为老处女孤苦终老,她开始了以赚钱为目的的创作活动。“生活的不易和坎坷的经历及现实主义世界观使得她对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抱有一种近似悲哀的敬畏心理”<sup>④</sup>也是这种敬畏迫使考琳·麦卡洛开始对人与自然、两性关系、民族融合、现代科技的双面性、自我追寻等问题进行理性思索。由于“见证本身就是巨大的伤害”<sup>⑤</sup>,见证了冷战阴霾、女性主义、生态主义、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等

①(澳大利亚)考琳·麦卡洛:《恺撒大传·十月马》,龙红莲、汪树东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②郭建斌:《民族国家内部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困境?出路?》,《新闻界》2018年第8期。

③刘云秋:《蒂姆·温顿访谈录》,《当代外语研究》2013年第5期。

④徐梅,刘久明:《考琳·麦卡洛小说的悲剧美及其净化意义》,《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⑤(美)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晓征、平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多种文化思潮的考琳·麦卡洛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和生态审美理念更加成熟,她认为自然有暴虐的一面、与土地为伴的农牧生活有着挥之不去的痼疾和局限;自然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但是大自然的暴虐和农牧生活的闭塞与落伍需要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运用来改善;人不是大自然的主人,但人也不应该匍匐在自然的脚下,成为大自然的奴隶,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人应该守护自然。经过浪漫与反浪漫的纠葛,经过理性主义的沉淀,考琳·麦卡洛笔下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人与自然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生态审美状态。

黑格尔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sup>①</sup>。考琳·麦卡洛通过浪漫主义想象对澳大利亚苍茫而又充满活力的自然进行了诗意书写,对远离阶级、种族歧视的“天人合一”的田园生活进行了赞誉,对大自然所富有的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拯救意义进行了升华,她在自然书写过程中彰显的这种浪漫情愫对读者的内心具有净化意义和德性提升功能,有助于激发读者内心深处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美好生活图景的向往和追求。考琳·麦卡洛对澳大利亚自然的浪漫书写及想象也对澳大利亚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做出了积极贡献,Gwen Morris在《美国肥皂剧中的澳洲元素——评考琳·麦卡

洛的《荆棘鸟》》中对《荆棘鸟》在美国风靡的原因进行了探究,其中就提到了考琳·麦卡洛作品中的澳大利亚浪漫自然元素对美国人的吸引力<sup>②</sup>。在赞誉自然美的同时,考琳·麦卡洛不忘从反浪漫的角度对农牧生活、丛林生活、兄弟情义的局限性进行犀利的批判,并从生态美的角度,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理性思索,强调了人应该守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意义,她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主义思想让读者获得了一种德性提升,使他们深切体会其中蕴含的生态内涵,进而产生审美理解、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考琳·麦卡洛通过浪漫/反浪漫的叙述方式对自然的两面性、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理性思索和生态学意义上的建构,她这种既浪漫又反浪漫的叙述方式是对传统浪漫主义唯自然至上叙述方式的突破和创新,也对当代的自然书写富有启迪意味。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时代,而生态文明要解决的终极问题是人的问题,考琳·麦卡洛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学建构既是对时代精神的回应,更是对人的问题的思索,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考琳·麦卡洛已经超越了学界对其畅销书作家的界定,她肩负起了一名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索和探究的神圣使命”<sup>③</sup>。

## Build a Perfect World in Romance and Anti-romance:

###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s of Colleen McCullough's Novels

XU Mei<sup>1,2</sup> & LIU Jiu-ming<sup>1</sup>

(1.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2. Teaching Supervision Center, Northern Beij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e, Beijing 101400, China)

**Abstract:** The collision between Romantic and Instrumental outlooks of nature is manifested in the Australian writer Colleen McCullough's works as a romantic/anti-romantic entanglement. Colleen McCullough, with her romantic feelings and various traumas, expresses the theme of nature in a romantic and anti-romantic way. While she imagines the nature in a romantic way, she also backwashes the Romanticism outlook of nature. On the basis of anti-romance, she examines and ponders ecologically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lass, race and identity pursuit, and constructs a perfect world.

**Key words:** Colleen McCullough; romance; anti-romance; outlook of nature; ecological aesthetics

(责任校对 游星雅)

①(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7页。

②Gwen Morris. "An Australian Ingredient in American Soap: The Thorn Birds by Colleen McCullough",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1991 (24): 59-69.

③周启华,徐梅:《传统目光的颠覆与超越——考琳·麦卡洛小说对凝视问题的思索》,《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